

救亡再次壓倒啟蒙

——「五卅運動」與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天折

◎ 廖久明

1986年，李澤厚在《走向未來》創刊號上發表了〈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概括為「啟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而把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概括為「救亡壓倒啟蒙」¹。這一觀點提出後，在獲得一片喝彩聲的同時，也漸漸遭到一些人質疑。2002年，李楊在《書屋》第5期上發表了〈「救亡壓倒啟蒙」——對八十年代一種歷史「元敘事」的解構分析〉：「通過對『救亡』與『啟蒙』、『傳統』與『現代』這一二元對立的解構，嘗試提供另一種理論解釋，即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出現的『救亡』與『革命』，不但不是『啟蒙』的對立面，反而是『啟蒙』這一現代性生長的一個不可替代的環節；不但沒有『中斷』中國的現代進程，反而是一種以『反現代』的方式表達的現代性。」²由於篇幅關係，更由於筆者對事實的偏愛，本文不擬就「救亡」與「啟蒙」的關係進行「理論解釋」，僅以「五卅運動」為例，說明「救亡」是如何壓倒「啟蒙」的，並以此紀念「五卅運動」爆發八十周年和第一次思想革命的主要刊物《新青年》創刊九十周年及第二次「思想革命」的主要刊物《語絲》、《現代評論》、《猛進》、《莽原》、《狂飆》等創刊八十周年。

一 《新青年》分裂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

1921年初，《新青年》最終分裂。與「五四」時期的其他刊物相比，《新青年》有一個顯著特點：「從大體上看來，《新青年》到底是一個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數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場發表他們對於文學的議論。」《新青年》分裂後，文學社團雖然大量湧現：「從民國十一年（1922）到十四年（1925），先後成立的文學社團及刊物，不下一百餘」，但這些文學社團培養的是「大群有希望的青年作家」³，而不是「文化批判者」，所以，《新青年》的分裂，標誌著轟轟烈烈的思想啟蒙告一段落。

在《新青年》分裂的同時，文學研究會於1921年1月正式成立。文學研究會的宗旨包括：「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⁴。1923年，鄭振鐸接編《小說月報》之後，在「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的欄目中發表了〈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同時還發表了顧頡剛、王伯祥、余祥森、嚴既澄、玄珠的文章，這些文章「大概都是偏於主張國故的整理對於新文學運動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論調」⁵，鄭振鐸特別強調「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堆中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下去。」⁶至此，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在從事創作與翻譯的同時，逐漸兼顧到中國古典文學的整理與研究。鄭振鐸在

提倡整理國故的同時，還與研究系的張君勱、張東蓀等人商議，「創辦一份以宣傳唯心史觀為宗旨的雜誌，企圖通過對唯心史觀的宣傳，廣結同志，為日後組黨作好準備。」⁷1923年1月，以整理國故為宗旨的《國學季刊》出刊，胡適在發刊的《宣言》中提出，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⁸。

1925年5月，初期創造社「圓鼎三腳」⁹的郭沫若（另兩隻「腳」是郁達夫、成仿吾）一如既往地在《創造週報》上為孔子高唱讚歌：「我們崇拜孔子。……我們所見的孔子，是兼有康得與歌德那樣的偉大的天才，圓滿的人格，永遠有生命的巨人。他把自己的個性發展到了極度——在深度如在廣度。」¹⁰

在新文化派中的一些人提倡「整理國故」、為孔子高唱讚歌的同時，文化保守主義主義者和復古派卻大力提倡東方文化並對新文化運動進行攻擊。梁啟超發出了西方「科學萬能的大夢」已經破產的驚呼¹¹。梁漱溟認為西洋文化「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拋棄它」，「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¹²。張君勱認為「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¹³學衡派在〈評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評《嘗試集》〉（胡先驕）、〈論新文化運動〉（吳宓）等文章中對新文化運動發起攻擊。甲寅派的章士釗在〈評新文化運動〉中否認文化有新舊優劣之別，以此否定新文化運動的存在依據和存在意義。

《新青年》分裂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可用魯迅給《猛進》主編徐旭生的一段話來表述：「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革命』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¹⁴

面對「『反革命』的空氣濃厚透頂」的局面，原新青年同人聯合後來者開始了同異互現的第二次思想革命。

二 同異互現的第二次思想革命

（一）《語絲》與第二次思想革命

《語絲》的創刊雖然起因於一偶然事件，但實際上是新月社爭奪陣地的結果：「《晨報副刊》雖然是中國報紙中最早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副刊，而《晨報》本身卻是研究系的機關刊物。它的增出副刊，容匯新流，只是為了招徠視聽，裝潢門面而已。特別是胡適同新從歐洲留學回國的徐志摩、陳西滢等於1923年成立新月社後，就擠進《晨報副刊》這塊地盤，佔據門戶，另立營壘，醞釀著文化戰線上的一場新的鬥爭。1924年初，《晨報》當局、某大律師的兒子劉勉己從歐洲留學回來，與新月社氣類相似，遂相勾結，取代了蒲伯英成為《晨報》的代總編輯後，就想把孫伏園拉下編輯椅子，把魯迅等人從《晨報副刊》上排擠出去。但由於魯迅等人的作品深受讀者歡迎，影響較大，又礙於孫伏園的人際關係，《晨報》當局不無顧忌，所以，箭在弦上，引而未發。等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劉勉己蠻橫無理地抽掉魯迅（署名『某生者』）的《我的失戀》詩稿的所謂『抽稿事件』發生，孫伏園為了表示抗議，憤而辭去編輯職務，魯迅等人也相率退出，《晨報副刊》遂為新月社所佔據。為了另辟戰

線，建立陣地，在魯迅的支持和領導下，孫伏園另邀了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劉半農、川島、顧頡剛、淦女士等十六人，作為長期撰稿人，創辦了《語絲》，並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了創刊號。」¹⁵故魯迅說「抽稿事件」發生前，「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¹⁶。考察一下《語絲》撰稿人不難看出，他們多是像魯迅一樣，在《新青年》分裂後，「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而「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¹⁷的人。在周作人代擬的《發刊辭》中，交代了《語絲》的辦刊宗旨：「我們並沒有甚麼主義要宣傳，對於政治經濟問題也沒有甚麼興趣，我們所想做的只是想衝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儘自不同，但對於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我們這個周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

後人在總結《語絲》的主要內容時，曾將其歸納為以下幾點：一、「『語絲派』的主要成員大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對於瀰漫於思想文化界的復古倒退的惡濁空氣加以掃蕩，就成為語絲派鬥爭的主要目標」；二、「『語絲派』的另一個鬥爭矛頭是針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三、「『語絲派』的另外一條重要戰線是和『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四、「三一八慘案」發生後，「『語絲派』的成員對於軍閥政府的殘酷野蠻，一致予以抨擊和揭露，對於慘案的犧牲者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悼念」；五、「『四一二』以後，『語絲派』的主要鬥爭矛頭是針對蔣介石反動派的」；六、「《語絲》從一九二七年底遷至上海復刊並由魯迅接編後，它的主要鬥爭鋒芒指向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化戰線上的一個重要陣地」。¹⁸任何歸納都不可能包羅萬象，但從歸納的幾類來看，「對於瀰漫於思想文化界的復古倒退的惡濁空氣加以掃蕩」，當為語絲同人創辦刊物的主要目標。

（二）《現代評論》與第二次思想革命

《新青年》分裂後，胡適在提倡「整理國故」的同時，與人一起成立「努力會」，出版《努力周報》，提倡「好政府主義」。1923年10月21日，《努力周報》停刊，胡適承認：「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¹⁹在《努力周報》停刊前的10月9日，胡適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新青年》的使命在於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這個使命不幸中斷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繼續至今，六年不斷的作文學思想革命的事業，影響定然不小了。我想，我們今後的事業，在於擴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絕的努力，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基礎建築一個可靠的基地。」²⁰1924年9月12日，胡適發表〈努力的問題〉，說出了自己擬辦《努力月刊》的原因：「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那是不消說的了。即從思想方面看來，一邊是復古的思想，一邊是頌揚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徹底批評的必要。」²¹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該月刊最終未能辦成。

在《努力周報》停刊不久，胡適於1923年與人成立了新月社。胡適的《努力月刊》雖未辦成，但他的辦刊思想卻在《現代評論》上得到一定程度的體現：「儘管胡適沒有直接參與《現代評論》的組織和編輯工作，但他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過文章，更重要的是，他與『現代評論派』有著必然的精神聯繫，他與『現代評論派』的觀點同出於一個精神母胎。我們可以這麼說，胡適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自由主義的代言人。」「胡適在與『現代評論派』的聯繫中，始終貫穿著一條精神紐帶，這就是他們共同信奉的自由主義精神。」²²

《現代評論》創刊於1924年12月13日，主要撰稿人有王世傑、陳源、高一涵、唐有壬、胡適、楊振聲、陶孟和等，多為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分子。《現代評論》的《本刊啟事》交代了辦刊宗旨：「本刊內容，包涵關於政治、經濟、法律、文藝、哲學、教育、科學各種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獨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態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訐；本刊的言論是趨重實際問題，不尚空談。」刊物命名「現代評論」，「意即採取旁觀的評論時政態度，此中顯露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色彩。」²³「歐美派知識份子在政治上抱有自由主義的態度，希望借啟蒙的手段，培養一種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識，以建立一個歐美式的法制社會；在文化上，他們主張把中國的固有文明與近代西方新文明結合起來，擺脫傳統的思想模式以適應世界變化；在價值取向上，他們企圖堅持獨立的知識份子人格，以自由者的身份參與現實政治，追求獨立、公正、客觀。」²⁴

（三）《語絲》與《現代評論》的異同

由於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在「女師大事件」、「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等問題上進行過針鋒相對的鬥爭，一些人常把它們視作兩個完全敵對的團體，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以胡適為首的現代評論派，「尊重個性，思想開放，主張相容、多元的風格，當然可以破除封建一統的迷信狀態，同時也可維護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對抗左翼文化思想的壓力。」²⁵在「破除封建一統的迷信狀態」方面，現代評論派與語絲派無疑是一致的。「該刊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也表現出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兩面性：既有主持正義，揭露帝國主義、軍閥政府罪行，支持進步學生的言論，也有散步污蔑學生、為封建軍閥開脫罪責的流言；既對群眾的反帝反軍閥鬥爭有所同情，又站在章士釗一邊，攻擊支持學生的魯迅。周刊撰稿人政治態度本來不同，加上他們辦刊用稿又採取自由主義的寬容並包姿態和開放的平等精神，就勢必同時出現觀點對立的文章。」²⁶現代評論派在一些重大事件上表現出「兩面性」，其進步的一面當然與語絲派基本一致；就是其反動的一面，也與反動軍閥、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有所不同：他們中的多數言論，很大程度上是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提出了不合時宜的看法，並不是成心反動。況且，這些「重大事件」的發生，是創辦《現代評論》時不知道的。將《語絲》和《現代評論》與當時其他文學社團的刊物比較一下不難發現，它們與那些發表文學創作的刊物有很大不同，卻與《新青年》存在著更多相似的地方：以發表評論文字、進行思想革命為主。

由於「女師大事件」、「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等事件的發生，語絲派與現代評論派之間的鬥爭越來越激烈，似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這種鬥爭，只要是在思想界內部進行，不但不會削弱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力度，反而有利於擴大其影響並豐富其內容：

「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²⁷。任何一種東西（包括思想），在沒有其他東西作為參照物的時候，其前途是危險的：長期發展下去，自身缺乏活力，又沒有其他資源可供吸收，最終的命運只可能是滅亡。所以，新青年派分裂為現代評論派和語絲派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在「打倒孔家店」和「文學革命」這兩項任務基本完成的時候，沒有了強大敵人的新青年派必然分裂。新青年派分裂為現代評論派和語絲派後，有利於鞏固《新青年》時期的成果——這一任務主要由語絲派來繼續，有利於為啟蒙提供新的內容——這一任務主要由現代評論派來擔任；並且有利於這兩派在鬥爭中取長補短。

（四）呈燎原之勢的第二次思想革命

1925年3月6日，政論性周刊《猛進》創刊。魯迅收到《猛進》第1期後，在給主編徐旭生的信中也提出了「思想革命」的主張：「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²⁸徐旭生在回信中說：「『思想革命』，誠哉是現在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總覺得《語絲》，《現代評論》和我們的《猛進》，就是合起來，還負不起這樣的使命。我有兩種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來，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裏面的內容，水平線並無庸過高，破壞者居其六七，介紹新者居其三四。……第二我希望有一種通俗的小日報。」魯迅在回信中說：「有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確是極好的事，字數的多少，倒不算甚麼問題。第一為難的卻是撰人，假使還是這幾個人，結果即還是一種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訂的各周刊之類。況且撰人一多，則因為希圖保持內容的較為一致起見，即不免有互相牽就之處，很容易變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東西，而無聊之狀於是乎可掬。現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小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知道也還有誰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從魯迅和徐旭生的信件可以看出，他們都承認《語絲》和《現代評論》進行的是思想革命的工作，而魯迅看見的更多是不同，徐旭生看見的更多是相同——由此也可看出，《語絲》和《現代評論》確實是「同異互現」。

鑒於刊物只用老作家的稿子，早在1924年5月30日魯迅就曾對許欽文說：「我總想自己辦點刊物。只有幾個老作家總是不夠的。不讓新作家起來，這怎麼行！我培養了些人，也就白費心思了。」²⁹在邵飄萍將《京報》副刊的《圖畫周刊》停刊，約請魯迅編輯時，魯迅立即於11日「夜買酒並邀長虹、培良、有麟共飲，大醉」³⁰，商議創辦《莽原》周刊；4月24日，《莽原》周刊創刊。在說到自己辦《莽原》周刊的原因時，魯迅說：「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雖在割去敝舌之後，也還有人說話，繼續撕去舊社會的假面。」³¹

第二次「思想革命」不但在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中心北京轟轟烈烈地展開（以上刊物所在地當時均在北京），甚至在其他地方也有了類似要求。1924年9月1日，高長虹在山西太原創辦了《狂飆月刊》。該月刊剛出一期，高長虹就將其交給高沐鴻、藉雨農等，隻身到了北京，於1924年11月9日創辦《狂飆》周刊。在《本刊宣言》中，高長虹發出了「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打倒」³²的戰叫。後來，高長虹在說到自己創辦《狂飆》的原因時說：「我走進文藝界時的理想，是把文藝界團結起來與現實的黑暗勢力作戰」³³。當時出版界的熱鬧，可用時人的一段話來表述：「這年來自《語絲》、《現代評論》、《猛進》三刊出後，國內短期出版物驟然風起雲湧，熱鬧不可一世」³⁴。

儘管「科學」、「民主」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但就是「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的啟蒙方面」也表現為「某種科學主義的追求」³⁵。據統計，《新青年》上「民主」「『只是『科學』出現頻度的四分之一強」，其他刊物如《新潮》、《每周評論》、《少年中國》上的情況也與此大體相似³⁶，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一個科學話語共同體的運動」³⁷。第二次思想革命的著眼點則由「科學」轉向了「民主」。方敏在分析「『五

四』後三十年民主思想的發展和演變」³⁸時，將1922–1931年間出現的「民主」歸納為新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三種類型說明：在當時的中國，「民主」是國民黨、共產黨和中間勢力的共同訴求。這次思想革命若能堅持下去，「二十世紀中國人在科技和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民主和人權的進步一直步履維艱」³⁹的情況也許不會如此嚴重。遺憾的是，「五卅慘案」發生了，六年後，「九一八事變」又發生了，中國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將主要精力由「啟蒙」轉向「救亡」。

三 「五卅運動」與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工人，為抗議資方無理開除工人，舉行罷工。次日，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憤。30日，上海學生、工人三千餘人，在租界進行宣傳，聲援工人，號召回租界，英巡捕開槍射擊，當場死四人，重傷後死九人，傷者不計其數。當天晚上，工人、學生、商界等團體連夜開會，商議對策。第二天，繼續到租界示威、宣傳、鼓動全上海人民實現「三罷」——罷課、罷工、罷市。6月1日，屠殺者又一次製造了「六一血案」，當天晚上，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提議成立工商學聯合會。6月4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正式成立。以後，上海的「三罷」鬥爭便在工商學聯合會領導下進行。

當上海工人階級英勇反帝時，省港罷工工人於7月3日正式成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公開領導香港和廣州沙面工人的罷工鬥爭，「在罷工工人和農民的幫助下，廣東革命政府舉行第二次東征和南征，打敗了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封建軍閥——陳炯明、鄧本殷，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全國各地不少領袖轉移到廣東，加強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上海、湖南等地工人，也紛紛到廣東參軍，決心和廣東工農群眾一起參加北伐戰爭，拿起武器摧毀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牆腳——北洋軍閥政權。廣東彙聚了各地的革命力量，迅速成為全國大革命風暴的中心。從廣州開始的北伐戰爭正在積極準備著。」⁴⁰

「五卅慘案」發生後，馮玉祥以多種形式支持人民反帝愛國運動，在其駐軍的河南省，「全省共有一百零八縣，全部投入五卅反帝運動。」⁴¹「五卅運動後，各帝國主義勾結起來，採取聯合行動。不同派系的軍閥相互妥協，形成反赤大同盟。他們把同情革命的馮玉祥宣傳為『赤化』人物，視國民軍為『赤化』武裝。」⁴²

為「討赤」進入北京的張作霖，1926年4月26日殺死了當時炙手可熱的《京報》記者邵飄萍——郭松齡倒戈時，邵飄萍曾幫郭罵張作霖，「邵被殺後，北京空氣極為緊張，很多報刊都紛紛自動停刊，以免遭殃。原來民國初年軍閥時代，新聞卻是相當有自由的，軍閥們雖然蠻不講理，可是對新聞批評大體還能容忍。直到奉軍入京後，形勢才為之一變，邵飄萍被槍斃後，人人為之自危。」⁴³「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大火昆岡，玉石俱焚』之概了。」⁴⁴語絲派的林語堂、顧頡剛、魯迅、孫伏園、川島等先後離開北京去了廈門。

張作霖殺記者，畢竟屬個別軍閥行為。北伐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統一了中國，結束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同時也結束了思想界一度出現的繁榮局面：「大多數軍閥是守舊的，和傳統的社會準則是很協調的。自相矛盾的是，他們所促成的不統一和混戰卻為思想的多樣化和對傳統觀念的攻擊提供了大量機會，使之盛極一時。中央政府和各省的軍閥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

學、期刊、出版業和中國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機構。在這些年代裏，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可能以甚麼方式實現現代化和增強實力進行了極其激烈的討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軍閥主義弊端的反應。共產黨於1921年建立和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於思想的繁榮。因此，一方面，軍閥時代是二十世紀政治團結和國家實力的低點；另一方面，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學成就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對軍閥的反應，從這個動亂而血腥的時代湧現出了終於導致中國重新統一和恢復青春の思想和社會運動。」⁴⁵

北伐戰爭期間，在「五卅運動」中得到鍛煉の上海工人進行了三次暴動，「因為工人運動の高漲，引起民族資產階級の驚恐；同時因為帝國主義者對於民族資產階級の壓制和利誘，因此民族資產階級決然退出革命戰線，因此而有上海四·一二與廣東四·一五慘案發

生。」⁴⁶接下來便是5月21日長沙の馬夜事變和7月15日武漢の汪精衛の分共會議，至此，國共合作徹底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國民黨の屠殺所嚇倒，連續發動了三次大的起義：1927年8月1日の南昌起義、9月9日の秋收起義、12月11日の廣州起義，開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の新時期。中國大部分知識份子也逐漸演化成兩大陣營：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傾向共產黨，以胡適為代表的右翼傾向國民黨。在中國建立一個甚麼樣的國家（救亡）成為第一要務，思想革命（啟蒙）則被擠到一個不為人注意の角落：救亡——更準確地說是政治事件，再次壓倒了啟蒙！

註釋

- 1 李澤厚：〈救亡與啟蒙の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第7頁。
- 2 李楊：〈「救亡壓倒啟蒙」——對八十年代一種歷史「元敘事」の解構分析〉，《書屋》，2002年第5期。
- 3 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茅盾全集·20》，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453-461頁。
- 4 〈文學研究會簡章〉，《小說月報》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
- 5 西諦：〈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發端〉，《小說月報》，第14卷1號。
- 6 鄭振鐸：〈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小說月報》，第14卷1號。
- 7 鄭大華：《張君勸傳》，中華書局，1997年，第177頁。
- 8 耿雲志：《胡適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0頁。
- 9 郭沫若：〈學生時代·創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213頁。
- 10 郭沫若：〈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郭沫若佚文集（上冊）》，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00頁。
- 11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節選）》，《梁啟超文選·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410頁。
- 12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節選）》，《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91-192頁。
- 13 張君勸：〈人生觀〉，《張君勸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14頁。
- 14 魯迅：〈華蓋集·通訊〉，《魯迅全集·3》，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1-22頁。
- 15 張梁：〈評「語絲派——」兼談周作人〉，《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80年第3期。

- 16 魯迅：《三閑集·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4》，第165頁。
- 17 《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4》，第456頁。
- 18 張梁：〈評「語絲派——」兼談周作人〉，《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80年第3期。
- 19 耿雲志：《胡適年譜》，第124頁。
- 20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華書局，1979年，第217頁。
- 21 耿雲志：《胡適年譜》，第131頁。
- 22 倪幫文：〈「現代評論派」的團體構成〉，《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3期。
- 23 黃裔：〈追本溯源：重談現代評論〉，《中國文學研究》，1991年第4期。
- 24 倪幫文：〈「現代評論派」的團體構成〉，《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3期。
- 25 吳福輝：〈現代文學移植的困厄和及歷史命運——論胡適與《現代評論》與《新月》派〉，《文藝爭鳴》，1992年第3期。
- 26 黃裔：〈追本溯源：重談現代評論派〉，《中國文學研究》，1991年第4期。
- 27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第417頁。
- 28 魯迅：《華蓋集·通訊》，《魯迅全集·3》，第22-24頁。
- 29 許欽文：〈來今雨軒〉，《〈魯迅日記〉中的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頁。
- 30 《魯迅全集·14》，第542頁。
- 31 《魯迅全集·11》，第63頁。
- 32 高長虹：〈本刊宣言〉，《高長虹文集·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36頁。
- 33 高長虹：〈一點回憶——關於魯迅和我（二）〉，《高長虹文集·下》，第511頁。
- 34 伏園：〈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界略述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1》，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第119頁。
- 35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1987年，第51頁。
- 36 金觀濤、劉青峰：〈《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1999年12月號。
- 37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三聯書店，2004年7月，第1208頁。
- 38 方敏：《「五四」後三十年民主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8月，第39-74頁。
- 39 金觀濤、劉青峰：〈《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1999年12月號。
- 40 傅道慧：《五卅運動》，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75頁。
- 41 傅道慧：《五卅運動》，第129-130頁。
- 42 郭緒印、陳興唐：《愛國將軍馮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05頁。
- 43 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集》，中國友誼出版社，1992年，第385頁。
- 44 魯迅：《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三》，《魯迅全集·3》，第288頁。
- 45 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356-357頁。
- 46 華崗：《中國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第229頁。

廖久明 任職於四川省樂山師範學院中文系，著有《高長虹與魯迅及許廣平》以及論文多篇。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五期（2005年12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